

【史海钩沉】

明清山东运河泉事

□孙南邨

《天下在河上——中国运河史传》中说：“运河山东境内的会通河段，水源最为金贵，因此在山东的东平、滋阳、邹县、曲阜、泗水、滕县等14个州县共设有管泉老人98名、泉夫2632名，专门负责看护供运河的泉源。”这里说的是明代初年治理会通河之后的事。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，尤其是明清两代，乘船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官员、文士，对运河之事多有记述，然而说到泉河济运的管泉之事却非常罕见。难道管泉之事不重要吗？不，在明清时期极其重要，甚至重要到就连当今对运河有所研究的学人，初闻此事也会感到吃惊的程度。

京杭运河全程“水脊”（至高处，分水岭）在山东，此处运河之水分南北流。因地理环境所致，在京杭运河会通河段为调节水势而修建的闸坝也特别多。虽如此，临清至沛县沽头段运河仍是水源不稳，时患浅涩。至明代初期，因连年战争，疏于治理，这段运河已难以通航。

燕王朱棣即位后，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决定迁都北京，以南京为留都，直到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才正式迁移。这期间，朱棣为迁都做准备而建设的有两大工程，一是修建北京皇宫、京城，二是整修京杭大运河。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负责运河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山东运河不畅问题，重开会通河。他听从汶上白英老人的建议，筑东平戴村坝，把运河南北分水点由任城（今济宁）调整到南旺“水脊”处，引河、湖、泉水济运。因地势北高南低，在南旺“水脊”控制分水，七分流往北，三分流往南，使京杭运河山东段得以通行。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明王朝停止海运，南粮北运全走运河一路。

鲁中至鲁南泰沂山脉自古多泉，引泉济运是明初整修运河的重大工程之一。永乐十七年（1419年），在漕运总兵官陈瑄的建议下初浚泉源，泰沂山脉西侧所能利用的泉源几乎都被引入运河。明代胡伯玉撰《泉河史》说“自会通河成，而涓滴皆为国家助矣”。明代张克文撰《泉河纪略》序说：“国家雄据燕都，漕河为之命脉。转输东南粟，岁计四百万奇。”

当“涓滴”泉水上升到“国家”大事的时候，对泉流的保护也就异常重要了，为此，漕运专门设立了管泉主事等官员和专项负责此事的役夫。《天下在河上》所引数字出自《大明会典》，山东涉及泉河济运的14个州县及管泉者分别是：东平州设管泉老人2名，夫72名；滋阳县设管泉老人2名，夫30名；邹县设管泉老人5名，夫120名；曲阜县设管泉老人1名，夫30

名；泗水县设管泉老人9名，夫195名；滕县设管泉老人15名，夫550名；峄县设管泉老人3名，夫60名；宁阳县设管泉老人6名，夫187名；泰安州设管泉老人14名，夫237名；新泰县设管泉老人14名，夫224名；肥城县设管泉老人3名，夫61名；莱芜县设管泉老人10名，夫215名；沂水县设管泉老人10名，夫500名；蒙阴县设管泉老人4名，夫150名。永乐十七年初浚泉源，以后每隔数年查访疏浚一次，新的泉源不断增加，据邹逸麟先生《山

东运河历史地理初探》说，明代山东泉源济运最多时涉及三府十八个县。

数字虽然是枯燥的，可正是因为有这组数字在，才让后人知道当年会通河段管泉范围之广，人数之众。这些管泉老人和泉夫究竟对泉流是怎么管理的？至今还没发现管泉者记其事的文字。想来也是，驿站之事在中国实行了那么多年，任务又是那么重要，今天国内也仅存有清代光绪年间，河西驿幕沈侨如先生留下的一册116天《河西驿纪略》。这么一想，管泉事务、规则只字无存也就可以理解了。毕竟此项工作太普通，即使当年有文字记录，也会因为引不起大家的重视而湮灭了。引泉济运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，难道泉流管理之事在书中真的是一无所存了吗？也不是的，若仔细寻求，在其他史料、诗文中还能发现一些管泉事迹。

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山东管泉老人、泉夫最多者是滕县（今滕州）。说来明初京杭运河还没有开挖南阳新河和洳河，运河没有经过滕县之地，然而滕县东部是连绵的群山，地势东高西低，那时南四湖（今统称微山湖）还没有连为一体，滕地的泉流也要为国家运河助一臂之力，水或导引到运河水柜，或直接注入流经谷亭（今鱼台县驻地）、沛县的京杭运河。

其实，上述14个州县大多远离运河，都在为济运作“无私奉献”。“涓滴皆为国家助矣”，对滕县当地的农事、民生有没有影响呢？明嘉靖乙丑（1565年）科进士王元宾，曾为家乡纂修《滕县志》（万历十三年版），他在卷三“山川”未有记：“元时滕州有稻堰，称饶给；国朝十八泉，则一切规之以济漕。而行水者奉法为厉，即田夫牵牛饮其流，亦从而夺之牛矣。一害也。”他接着又说到因济运开渠、筑坝对当地造成的二害、三害。因泉水济运，竟然连田夫饮牛也不可以，这似乎太过分了！为此，王先生大不满意，可国事大于民事，也只能在所编志书上记它一笔。

到了清初，滕县黄兰森以诗的形式记有管泉之事，寓意委婉，不知泉事的人大约很难明白黄先生的诗意。黄兰森是清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进士，他写有《缴沟泉野居》诗六首，其一是：“涓滴泉流济会通（原注：运河名会通），官蒲官柳长春风。居人若得溪边水，会种芙蓉万顷红。”《泉河史》载，缴沟泉为滕县济运之泉，距县城西南三十里迎仙乡。居民虽住在泉边，那水也不是随便动用的，因此“芙蓉万顷红”只是他的美好向往，或者说是一种无奈情绪的表现，身边的泉流只有滋润“官蒲官柳”（济运）而已。

据《泉河史》载，滕县有“浸五”“湖二”“泉旧十五，新四，凡十九”“桥六”（涉及泉流），另有薛河坝。滕县最东部的泉源流入西南运河约百余里路，泉流如此之多，其水不能饮牛，不能引灌，可知管理泉流者人多事忙了。胡伯玉在《泉河史》说：“弘治以前载于图记者，一泉多至三四十人，少不下十人；嘉靖之际，业去其半，然其少者犹足当今之多。”胡伯玉是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进士，他所说的“当今”由《泉河史》序言看是万历中期的事。管泉人相继裁革，然而泉流管理却不见放松。《泉河史》有言：“河渠有专官例不得亲民。”“不得亲民”是他们的工作，管泉人各司其职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管泉岂止对小民严格，即使贵为孔府之家有关泉事也不能任意而为。《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》载：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十一月，康熙帝到曲阜孔府祭拜孔子。礼拜后，衍圣公孔毓圻等趁机奏称：“圣庙前有桥，池中无水。曲阜城外有泉，可以开通引入城内庙前池中。且此泉水不通运河，原非济运之水。今遇圣驾亲临，谨此冒昧奏请。”御批是：“大学士明珠、王熙、衍圣公孔毓圻等所奏，曲阜城外泉水既不关系运河，著准其开通入城，交与该抚遵行。钦此。”孔府圣人家欲引城外泉水入城，要由当朝皇帝批准，而且还要找个“此泉水不通运河，原非济运之水”的理由，当年泉流济运管理之严可以想见了。

明清两代，乘船行于京杭大运河的官员、文士留下著述者甚多，韩国崔溥的《飘海录》，海宁谈迁的《北游录》，嘉定王初桐的《北游日记》等，对运河考察颇详，只是不涉泉事，这是因为管泉者的工作不在运河边上，他们目未睹、耳未闻，何记之有？倒是王元宾、黄兰森这样的文人，适逢其时，身处其地，亲历其事，对泉事感受最深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，一不注意就会形成文字，而且流传下来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“南北榜案”与成武状元韩克忠

□张长国

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取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，从隋唐时期开始，就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，也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科考案件。明洪武三十年的“南北榜案”就是其中一个，因为这个事件，成武县人韩克忠被明太祖朱元璋钦点，并成为明代山东第一位状元。

韩克忠（1370年—1439年），今成武县城北二里韩庄村人，据清道光《城武县志》记载：“韩克忠，字守信，洪武丙子科举人。丁丑，刘三吾、白信蹈主试，忠不与中式之列。刘白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，江北无一与者……”在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二月，明朝举行会试，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白信蹈主持，结果，包括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在内，录取的五十二人全部是南方人，结果引起北方举子的质疑和上告。朱元璋令人查清后，对两个主考官一个流放，一个处斩，并在六月重新进行了考试，所录取的六十一人全部是北方人，并钦点成武人韩克忠为状元。此事轰动天下，史称“南北榜案”。韩克忠中状元后，首先出资在家乡成武的县城东门内修了一座状元坊，此牌坊在上世纪60年代尚存。

朱元璋的家乡是安徽凤阳，与山东成武距离不远，因此朱元璋对成武举子韩克忠有着天然的好感。在朱元璋殿试的时候，朱元璋出的题目和“时事”结合得非常紧密，叫做策问，这从韩克忠的状元卷中就可以看出。“皇帝制曰：天生烝民有欲，必命君以主之。君奉天命，必明教化以导民……朕承天命，君主生民，宵衣旰食三十余年，储思积虑，欲安生民。其不循教者亦有，由是不得已施之五刑。今欲民自不犯，抑别有其术欤？”朱元璋这个问题的大概意思是，其做皇帝很多年，处心积虑想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但是还有人犯法受到惩罚。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让百姓不犯法？韩克忠的回答是：“臣对：臣闻五常乃民生固有之善，五刑实人君辅治之具……钦惟皇上诞膺天命，奄有万方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，已有年矣……臣愚以为，法愈严而人愈犯，盖由人心不古而轻犯之耳。今欲令行禁止，民不犯法，臣以为当再明号令，颁布中外。彰善癉恶，树之风声，俾克畏慕，使民彬彬然为善，而不至于为恶者也，不过明五常之教，而用五刑以辅其不及而已。”

在这个策论中，韩克忠说出刑罚是治理国家的辅助措施，之所以法律越严而受刑罚的越多，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古人醇厚，轻易就犯法了。他还举出对策，就是再明号令，颁布中外，惩恶扬善，在社会上弘扬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风尚。这和如今的法制宣传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同时，韩克忠在策论中还对朱元璋大大颂扬一番。朱元璋看后朱笔一挥，钦点韩克忠为状元。

韩克忠中状元后，朱元璋先让他担任翰林院修撰，三个月后改任国子监司业。国子监是国家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，针对当时国子监学政松弛的情况，他和祭酒张显宗一起制订了相关制度，并报朱元璋批准后实施，振兴了学习风气。在国子监司业任上，韩克忠还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，做到知人善任。成武县人王宾在保安郡安州担任学正，教育有方，门人多有所成，洪武三十一年，韩克忠以“德才兼备”向朱元璋荐举，于是，王宾升任了辽州直隶州知州，任上勤政爱民，受到百姓赞颂，最后做到了顺天府府丞，可见韩克忠的识人之能。朱棣夺取皇位后，他被贬谪为涿鹿令。直到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即位后，韩克忠才转为监察御史，但级别仍然是正七品，最后在任上去世，归葬家乡。

因《明史》上记录韩克忠是“武城人”，造成许多人把他当成了如今的德州市武城县人，引起了名人故里之争。其实，这并不是《明史》的误写，清初编《明史》时，是按照当时的明朝史料编写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菏泽历史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徐子红先生考证指出：“《清史稿·地理志·山东·曹州府》载：‘城武……明洪武四年，属济宁府，寻改属兖州府，以城武为武成。’”这就说明，在明初，成武县被改名为武成县，清初编写《明史》的时候，时人尊重历史而照实记录，并非误笔，更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韩克忠家乡是德州市武城县。

清乾隆二十一年的《曹州府志》多处记载了成武县韩克忠的事迹及墓葬地：在成武县，还有许多韩状元的遗迹，包括状元墓、状元坊等，都记载于清道光《城武县志》，这是韩克忠家乡在成武的有力证明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rwql@163.com



滕县黄兰森以诗的形式记有管泉之事



会通河南旺“水脊”